

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通讯

COMMUNICATION OF THE CENTER FOR CHINESE COMFORT WOMEN STUDIES

中国·上海·上海师范大学 (200234)

FAX: 86—21—64321873

第五期 (No.5)

Shanghai, China, Shanghai Teachers University

TEL: 86—21—64322819 2000年1月18日

2000年“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宪章(一)

(草案)

苏智良译

前言

即将过去的20世纪是一个充满暴力的世纪,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类经历了前所未闻的大量的杀戮与破坏,并给女性带来了痛苦的性暴力。不仅如此,世界各地至今仍在发生国与国及国内的战争,无数的无辜民众被杀死,女性们的身心更是受到严重的伤害。

日本军队在亚洲太平洋战争(1931—1945年)期间实施的性奴隶制度(即慰安妇制度),是本世纪最大规模的战争性暴力。那些被害妇女们在90年代开始打破沉默,提出控诉,要求恢复正义和人权。但是,即使是在战争已过去半个世纪的现在,具有加害责任的人和国家,仍没有认罪的言论、谢罪并进行赔偿,而很多的受害妇女却已死亡。

战后的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及在亚洲各地所进行的军事审判,几乎没有对日军性奴隶制度等对女性暴力的战争犯罪进行裁决。此后,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现行的裁判制度也对此没有予以追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制订了《世界人权宣言》、《国际人权公约》、《女性差别废除条约》等国际公约,卫护人权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及国家的责任和义务。特别是1993年维也纳世界人权会议宣言明确指出:对女性的暴力就是对女性人权的侵害。接着,同年的联合国大会也发表了《废除对女性暴力宣言》。1995年联合国北京世界女性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更明确指出:“战争状态下的强奸及性奴隶制等对女性的暴力,无疑是战争犯罪,必须揭露其真相,对被害者进行赔偿,并处罚加害者。90年代,联合国设立了原南斯拉夫及卢旺达国际战犯法庭,决定对在那里的对女性的暴力进行处罚。总之,依照普遍的国际人权及女性的人权观念,恢复性奴隶制等战争状态下的性暴力受害女性的正义与尊严,是构成国际市民社会的我们每个人的道德的责任,也是国际女性运动的一个重要课题。

为体现这一责任,特设置“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并由实施了日军性奴隶制的加害国的日本来组织。而由被害的国家和地区(韩国、北朝鲜、中国大陆、台

湾、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还有国际咨询委员会(关于女性人权的专家和活动家)这样三方面构成的国际实行委员会。

“女性国际战犯法庭”的目的,旨在究明作为日本帝国军队控制的殖民地及侵略战争一环——在亚洲各地设立慰安所,将大量女性强制弄为“慰安妇”的性奴隶制等性暴力的真相,明确国家及个人应负有怎样的法律责任;并恢复被害女性的正义、人权和尊严,切断并防止再发生战争状态下对女性暴力不处罚的循环。

“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并不是基于国家主权、或其他的政府的权力所进行的判决,而是民间妇女所提倡的国际民众法庭,是站在接受被害女性等众多人的勇气斗争的结果,是国际社会在女性人权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判决。因此,实行这样的判决并无法律的限定,而是基于国际法的正义所作出的判决。我们期待该法庭具有的道义上的权威被国际社会所接受,并实现之。

在20世纪最后一个月开幕的“女性国际战犯法庭”,是希望把这苦难的一页留在历史上并让全世界了解,是希望迎接一个没有战争及对女性暴力的21世纪。(待续)

1999年12月10日至12日,战争犯罪和战后补偿问题国际市民研讨会在东京举行。会议由日本国际市民研讨会实行委员会和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主办。

出席这次会议的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会长谭汝谦教授、史维会美国、加拿大的代表等,德国、韩国、中国大陆、台湾、香港、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近百人。日本一些近年来援助中国山西、台湾、菲律宾、韩国和在日韩国人受害者律师们也出席了该会。

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有复旦大学教授赵建民、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副主编荣维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研部主任李宗远、该馆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量、河北省社科院特邀研究员何天

义、哈尔滨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南开大学政法学院教授殷燕军、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副主任张连红、南京市档案馆研究员陈娟中国地图出版社社长秘书张品、华东政法学院国际法教授周洪钧和本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人李桂英在会议上以亲身的苦难经历控诉了日军的暴行。荣维木代表中国学者在大会上作了基调报告《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问题,实现21世纪的和解和平》。

主持或出席会议的还有荒井信一、藤原彰、田中宏、川田文子、有光健、伊藤孝司、土屋公献、一濑敬一郎、新美隆、王选、刘彩品等。

战争犯罪和战后补偿问题国际市民研讨会

2000年

女性战犯法庭国际调查会议在东京举行

1999年12月13日,由日本“战争与对女性的暴力”网络(简

称VAWW-NET JAPAN)主办的国际调查会议在东京召开。与会的有日本、韩国、美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中国、中国台北等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会议在著名的早稻田大学举行。会议对一年后举行的2000年女性战犯法庭的准备工作作了全面的检查和磋商。中国代表苏智良介绍了中国方面近年来从事慰安妇问题调查和研究的简况。

会议放映了各国和地区最近拍摄的关于性奴隶“慰安妇”的纪录片,听取了日军老兵关于慰安妇问题的证言。与作为2000年女性国际法庭检查官的国际法教授迪娜女性作了深入的交流。

会议要求各国和地区对日军实施的慰安妇制度,尽快进行调查,发表调查报告,揭露日军推行性奴隶制度的罪行,并写作英文的起诉状。

日本老兵证言慰安所犯罪

1999年12月11日日本老兵金子(79岁)在2000年女性战犯法庭的准备会上向与会代表介绍了战争时在中国战场进出慰安所,强奸性奴隶的事实。

他回忆说,战争时候,我当了五年兵,主要是在中国山东。

首先在青岛登陆。战争中士兵们干过“三光”政策,也见过强奸和轮奸。我也曾干过强奸的事情。上司从来不管。有一次,我们8个士兵对付一个中国妇女,我也是其中的一个,轮奸到后来,这个妇女好像是死了。我们的想法是,因为是战争,不知何时就会死去,所以就不必忍耐,想干什么都可以,很多都是这么想的。

“我是在昭和十九年(1944年)在山东的临清第一次看到慰安妇的。那是个规模不大的慰安所,只有6间房子。我进去后,管理者先问我,需要什么样的女子。我没有什么经验,就这样进去了,想不大慰安妇是个日本人,我大吃了一惊。……后来还遇到过流动的慰安所。就是一辆卡车,上面装了3个女人,到各个部队驻地去巡回。这个巡回慰安所是军队开设的,主计是个军人。巡回慰安所每个地方只呆两天,然后就开往下一个部队驻地。每次支付1.5日元,但我记得好象只有5到10分钟时间。那时一等兵一个月只有6.8日元。当然这钱是交给慰安所的军队管理者的。慰安妇很多是朝鲜妇女,当然也有中国女子。慰安妇当然是很苦的,没有休息,生理期间也要接待士兵。

我还记得在泰山脚下,日军设有兵站,我曾看到那里在搬运鸦片。

我是为了天皇去中国打仗的,但战败时,我被押送到了苏联。天皇没有救我,是中国人救了我。在苏联,我的战友有的唱着《君之代》自杀了,但我从来不唱《君之代》。我反对《君之代》。”

“我曾去过杨家宅娱乐所”

——后藤正夫的证言

苏智良

1999年12月日,抽了个空,我与西野留美子一道,在东久留米市采

访了老兵后藤正夫(假名)。

一见面,后藤老人让我吃了一惊。他像个退休工人似的出现在我们面前。“我是上海人,在上海出生,在上海住了60多年。”他纯正的上海话让我吃了一惊,他完全像一个上海退休工人。

接着后藤正夫回忆起往事。他说,那时他常去“杨家宅娱乐所”。

大正10年(1921年)8月9日,后藤在上海出生。父亲早亡,与母亲和姐姐一起生活。母亲稍有收入,姐姐在北四川路的夜总会里做舞女。他先是在今平凉路电机学院(当时是日本人学校)读书,初中高中在一起,毕业后入东亚同文书院。1941年,满20岁的后藤被应征加入日本军。在江湾五角场的华中派遣军司令部下面当暗号兵,属于第13军,为保密称登部队,他的工作就是给电报加上电码。后藤记得,当时五角场一带有不少慰安所。一般是中国慰安妇或日本慰安妇,似乎没有见到过朝鲜慰安妇。他指着“杨家宅娱乐所”的木屋照片说:就是这种房子,我几乎每月都去慰安所,每次都是步行去的,大多是一个人去的。进慰安所就在一个小窗口付钱,然后就能得到一块牌子,上面明确写着慰安妇的房间号码。如果先提出要某某号慰安妇,一般也能满足。慰安妇的房间地上铺着榻榻米,面积并不大,入房间只有30分钟。士兵一般也不与慰安妇说话。入场券要2日元,当时,二等兵一个月只有5日元,所以,一个月只能去两次慰安所。为了弄到钱,我们经常在军队的小卖店“酒保”里购买低价的香烟,然后再在街上设法高价卖出。每个慰安妇一天总要接待不少军人。因为我在司令部工作,因此,我们没有在慰安所前遇到过排长队的事情。军队给士兵每个月发两只避孕套,最初是橡胶做的,后来因为物资越来越缺乏,到1944年竟然发了用羊肠做的避孕套,当然是很不舒服的。

后来后藤回到了上海,约在1946年与现在的妻子结婚,为了顺利登记结婚,后藤取名杨泉根。他妻子及她的兄长陆明昌,曾在海军慰安所“大一沙龙”里工作。所以知道一些“大一沙龙”的情况。“大一沙龙”的经营者原在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工作过,当然有不少关系,因此,生意很好,去的多是将校。起初,“大一沙龙”除海军外,日本商人也能出入。“大一沙龙”的西面还有“沪月”(不是“湖月”)、“一力”、“上海花坛”、“六三亭”等料亭。横浜桥边也有一个规模很大的慰安所。

日本政府规定,军龄4年以上的可以领取军人退休金,每年有200万日元左右。后藤因为只有3年半左右的军龄,因此,一分钱也没有领到过。

上海解放后,后藤在上海标准件五厂做工。后来曾发生工伤,左眼失眠。到54岁提前退休。文革时,日本人的后藤自然被认为是日本特务,被进行了严厉的批判。1983年后藤全家到日本。现在他有6个儿女(4儿2女),儿女嫁娶的都是中国人。作为大一沙龙慰安所见证人,妻子的兄长在1999年10月去世了。“我的大半生是在中国、在上海度过的。我们全家准备到上海,这也许是我人生的最后一次机会了。”后藤最后无限留恋地说。

采访后藤先生,是我这次匆匆东京之行的一个额外的收获。